

【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研究专题】

机器印刷术的传入与阅读转型*

●熊 静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摘要] 19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机器印刷技术的传入,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机器印书的普及,促使图书生产效率成倍提高,书籍数量和门类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在技术变革和社会思潮的双重影响下,中国阅读史迎来了第三次转型时期。人们的阅读范围不断扩大,阅读的普及率迅速提高,通俗阅读蔚然成风,也对传统经典的定义进行了新的诠释。参考文献 17。

[关键词] 机器印刷术 阅读转型 经典阅读

[中图分类号] G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845(2015)02-0014-05

1 引言

自唐代中期印刷术发明以来,以木刻版印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出版业,长期保持着稳定而缓慢的发展速度。其间虽有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但活字印书的应用范围一直十分有限,并未打破古代出版业的原有格局。然而,传统出版业缓慢发展的局面,却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被无情地打破了。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介入,中国的雕版印书业也许还会沿着原来的路线继续缓步前进。然而,晚清以来,列强坚船利炮的刺激,以及西风东渐的影响,使得中国社会从根本上发生着变化。不管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学习,西方文明以一种近乎强横的姿态,强势地浸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价值观在重组,对传统经典的认识也在经受考验。中国出版业处于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可避免地被历史的洪流裹挟前行。伴随着西方先进出版技术,特别是铅字印刷术的传入,我国的出版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机器印刷逐渐取代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成为了图书生产的主要方式。

技术变革,特别是由技术变革所引发的文本变迁,对阅读史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自文字发明以来,以纸筒替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为标志,我国古代阅读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时期。机器印刷术在我国的普及,开启了第三次阅读转型的序幕。而这次转型所带来的影响,不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2 机器印书时代的阅读特征

随着机器印刷术的普遍应用,图书出版更加快

捷,报纸杂志等一些大众读物也不断增多,这对传统阅读带来了很大冲击。由于西学引进与新式教育的开展,阅读的内容也变得比以往更为丰富多样。从阅读的形式上看,过去强调高声朗诵、熟读成诵,而此时大多数人只是默读、泛泛浏览。在经典阅读方面,展现了从艰深到浅显,从文言到白话,从原本到节本,从专集到选本的特征,呈现了大众化和通俗化的发展趋势。

2.1 机器印书时代的图书出版

中文铅印技术,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发明的。19世纪中叶,出于传教的需要,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地区开设了一些出版机构,印制宗教书籍。为了提高印刷效率,传教士们将西方先进的印刷术带到了中国,并成功地应用和发展了中文铅印技术^[1]。其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铅印技术很快被官书局吸收,中国本土的出版机构也迅速地超越了教会,成为出版业的中坚力量。特别是20世纪初以后,民营出版社发展迅速,上海成为了亚洲的出版中心,出版规模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1911年至1949年9月间,在我国出版的中文图书有124 000余种^[2]。如果做一个横向比较,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也只有3 461种,加上6 793种存目,总数不过一万余种^[3]。当然,《四库全书》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古代典籍的总量。但是,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业,在效率上远远不如机器印刷,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因为印刷效率的翻倍提高,自晚清至民国时期,我国书籍的出版总量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不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研究”(项目编号:10ATQ003)的研究成果之一。

到百年的时间里,积累的书籍和知识总量,超过了以往所有朝代的总和。这对阅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除了数量上的激增,和出版速率的加快,民国时期出版业还有几个突出的特征。第一,是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统计,一百余年间,我国出版的中文期刊约2万余种^[4]。另外还有报纸1万3千余种^[5]。与图书出版相比,报刊杂志的时效性更高。而且报刊的主要受众是普通民众,因此在娱乐性和可读性方面,较图书有更高的要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新青年》、《新潮》、《晨报》及其副刊等许多报刊杂志,还起到了引领舆论导向,启发青年学生的作用。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凭借其时效性高的优势,成为了各派势力争夺民众支持的主要阵地。而一些著名的报刊,又反过来利用其巨大的影响力,主导了社会思潮和人们的阅读风尚。此外,民国时期还涌现了大量通俗杂志,其中有的以生活、娱乐信息为号召,著名者如《申报》、《良友》等;有的面向特定阅读群体,如以女性为目标客户的《妇女杂志》等。正是这些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报刊杂志,培养了人们通俗阅读的习惯,也加快了阅读由精英走向大众的步伐。

第二,丛书的出版。有学者据《中国丛书综录》和《补正》,以及《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做出过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丛书约有6400余种^[6]。丛书数量的激增,与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的迅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对于阅读者来说,丛书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原本稀有难见的珍本、秘本,化身千万,能够被普通的读者所拥有和阅读。此外,一套丛书类聚了同类型的多种书籍,免去了人们寻觅资料之苦,这对读者,特别是研究人员来说,意义重大。丛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研究的思维和方法。

第三,教科书的出版。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开启以后,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教育对象从精英向大众过渡。民国时期,各种教材,特别是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十分繁荣。据统计,在民国38年里,共有90余家出版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参与到了各种类型中小学教材的出版活动中来^[7]。学校教育是人们阅读习惯养成的重要平台,各种内容丰富,门类齐全的教材,起到了激发阅读兴趣,构建知识体系的重要作用。

2.2 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与阅读转型

中国古代的学术体系,是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

为骨架,以儒家经典为躯干搭建起来的。早期书少价昂,知识分子能够看到的书籍有限,而随着技术条件的进步和知识总量的累积,越到后来的朝代,人们所能拥有的书籍就越多,阅读方法也发生了从精到博的转变。清代著名学者崔述就曾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总结:

大抵古人多贵精,后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后人之学远非古人之所可及。古人所见者经而已,其次乃有传记,且犹不敢深信。后人则自诸子百家、汉唐小说、演义传奇,无所不览。自《庄》、《列》、《管》、《韩》、《吕览》、《说苑》诸书出,而经之漏者多矣;自三国、隋唐、东西汉、晋演义及传奇小说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8]。

但是,在1840年以前,不管读书人的阅读范围如何扩展,仍然局限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学科体系中。鸦片战争后,西方社会思潮迅速涌入中国。有学者统计,洋务运动期间,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的译书就达160种之多^[9]。对于当时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寻求一条救国的道路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节节败退,人们自然地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中国传统文化,转而向西方学习,期望寻求到一条自强自新之路。不管是清末的洋务运动,还是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主流的声音都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于是,仿照西方学科体系规范中国学问,建立中国的近代学科体系,成为了几代学者持之以恒的追求。而近代学科体系建立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传统四部分类法的突破,以及新的分类体系的建立。我们仍以《民国时期总书目》为例,该书按照学科分为20卷出版,每卷的类别和收书数量如下表所示:

表1 《民国时期总书目》分类收书数量表

类别	数量(种)	类别	数量(种)
哲学、心理学	3 450	中小学教材	4 055
宗教	4 617	语言文字	3 861
社会科学总类	3 526	中国文学	16 619
政治	14 697	世界文学	4 404
法律	4 368	历史地理	11 029
军事	5 563	自然科学	3 865
经济	16 034	医药卫生	3 863
文化科学	1 585	农业科学	2 455
艺术	2 825	工业技术、交通运输	3 480
教育、体育	10 269	综合性图书	3 479

从上表的学科分类和收书数量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我国的学科体系建设基本上照搬了西方的模式。对于民国时期的读书人来说,新学科的建立,以及社会发展对于知识结构的要求,都要求人们自觉或被动地更新自己的阅读体系,拓展阅读范围。如果与中国传统社会的阅读体系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民国时期,人们的阅读行为有两个新的特征,其一是自然科学知识所占比重上升,其二是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传统经典阅读的重新认识。

2.3 经典阅读的重新定义

20世纪初,针对传统经典是否还具有生命力,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持激进态度者,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要求彻底废除孔教。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文字学家钱玄同就曾提出: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10]。

事实上,发出这样激烈的声音,与当时知识分子希望尽快寻找到中国独立自强之路的迫切心情密切相关,是时代的产物。而当讨论更加深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理性时,中西并重成为了学界的共识。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1]。

可见,在与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的比较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中国的传统经典,历经岁月洗礼流传至今,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如果完全不了解本民族的思想传承,必然会在认识世界的能力上有所缺陷。当然,虽然说传统经典在新时期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经历了西方观念重塑的中国人,在对经典的认识上已经完全不同了。

首先是经典范围的扩大。中国古代对经典有着

严格的定义。唐刘知几《史通·叙事》谓之:“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12]也就是说,只有圣贤的著作才能被称为经典。因此,古代经典的范围很窄,基本上只有三代流传下来的作品,以及先秦时期的儒家著作和朱子的部分论著,能够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成为读书人必读的经典。民国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儒家成为了批判的对象,而传统文化中原本不被人重视的通俗文学作品开始大放异彩,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人们甚至要求将俗文学作品的地位提高到与传统经典平等的位置上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明确地提出:

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霑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近来颇有人注意戏曲和小说了;但他们的注意仍不能脱离古董家的习气。他们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说,而不知道在历史的眼光里,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传》和一部精刻的残本《五代史平话》有同样的价值,正如《道藏》里极荒谬的道教经典和《尚书周易》有同等的研究价值^[13]。

无独有偶,上世纪20年代,胡适曾应邀为青年学子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古籍名著190种,后来作者在此基础上精简成《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其中没有收录“小学”方面的书,也不选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反而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等通俗小说赫然在列。梁启超对此颇不以为然,还专门撰文提出过批评^[14]。上引《发刊宣言》,可以看成是胡适对自己列出的国学书目的解释。在对经典范围的具体定义上,民国时期的学者可能存在着争议,但是经典范围的扩大,以及通俗文学作品地位的上升,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是对经典态度的转变。在传统文化中,经典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5]对于经典,要保持敬畏的态度,不要说对经典提出质疑,即使是一字之改易也是不能接受的。民国以后,在学术研究中强调科学方法的应用,对于一切问题都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经典和其他史料一样,仅被认为是供研究之用的材料。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就是这种思潮的集中反映。这个后来对中国国学研究影响巨大的流派,其思想源流,就是来自胡适

的“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16]。可见,虽然民国时期的学人仍然阅读经典,研究传统文化,但是他们对经典所持的态度已经是全新的了。经典不再被供奉在神坛之上,人们可以通过阅读经典来加深对人生的体悟,当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质疑经典的正确性。

2.4 大众教育与通俗阅读

最后,我们要谈一谈民国时期大众教育和通俗阅读的问题。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在多方压力下,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宣布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废除科举制度,开办新式学堂。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就此走向了终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也因此驶上了快车道。中国近代史上的教育改革,不是两千余年来中国传统教育体系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更多地源自于外来文化的刺激,特别是西方列强入侵带来的危机感。教育改革的整体思路,是以国民教育代替精英教育,提高全民受教育的程度,并在知识结构上,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协调发展。

既然要让更多的普通人接受教育,学习文化,中国古代的书面用语——文言文的劣势就十分明显了。文言文极难掌握,能顺畅地运用文言文写作,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少数人的专利。因此,在提倡全民教育的时代,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就曾以近乎绝决的态度表明了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看法:“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也,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7]虽然后来的学者对20世纪初期这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臧否不一,但白话文最终还是取代了文言文,成为了人们写作和阅读的主要文体。

白话文的使用和大众教育的兴起,对阅读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推行白话文,进一步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用白话文写作,编写教材,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白话文著作、报刊杂志出现,普通人也可十分容易地掌握新知识,阅读新作品,丰富了人们的阅读环境。但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也同样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由于学校教育不再将文言文作为学习的重点,民国以后的不少学者,特别是青年人,古文阅读能力下降,无法读懂中国的传统经典,阅读行为呈现出浅层化、庸俗化的倾向。

3 结语

阅读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阅读的发展受到载体形态、文本变迁,以及社会思潮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回顾中国古代阅读史可以发现,每次技术变革,或者社会急剧变动的年代,人们的阅读行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我们将阅读史中的这种现象称为阅读转型。每次的阅读转型,都是对旧有阅读模式的一次检讨和重组,取而代之的新模式,既有对旧模式的超越,也不免会丢弃一些好的传统。正如我们在文中一直试图说明的那样,随着技术条件的进步,书籍的数量越来越多,人们可以很轻松地拥有大量阅读材料,这无疑使得阅读变成一件越来越轻松的事情,阅读者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更多的人享受到了阅读的乐趣。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正是由于获取难度降低,而可供选择的读物又太多,人们的阅读变得愈发浅层化。古代阅读中的一些优良传统,如精读、诵读的习惯,在今天已经难觅踪迹。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要进行阅读史的相关研究。对历史的回顾,归根结底是为了指导当下的实践活动。我们对历史上的阅读转型时期进行总结,就是要宏观的把握阅读史的发展脉络,并为今天的阅读推广活动总结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参 考 文 献

- [1][7] 王余光,吴永贵.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7,389.
- [2]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出版说明[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1996.
- [3] (清)永裕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M].北京:中华书局,1965:3.
- [4]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增订本)[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
- [5] 何艳艳.两大民国期刊数据库比较研究[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3):66.
- [6] 贾鸿雁.民国时期丛书出版述略[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2(6):63-66.
- [8] (清)崔述.考信录提要及其他二种·释例[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6:20-21.
- [9]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00.
- [10]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N].新青年(4卷4号),[1918-04-15].
- [11]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M]//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84-285.
- [12]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366.
- [13] 胡适.发刊宣言[J].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1).
- [14] 梁启超.国学指导二种·治国学杂话[M].上海:中华书局,1936.

- [15] 杨伯峻, 杨逢彬注译. 论语译注[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205.
- [16] 胡适. 自述古史观书[M]//胡适文集3·文论.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355.
- [17] 陈独秀. 答胡适书[N]. 新青年(3卷3号), [1917-05-01].

[作者简介] 熊静, 管理学博士,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

[收稿日期] 2014-12-24 (刘平 编发)

The Modern Printing Technology be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Reading Transformation

Xiong J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19th century,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machine printing technology, there have been significant changes in China's publishing industry. When machine printed book became popular, the number of books was greatly improved. Under the dual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trends of social thought, Chinese reading history has been taking great changes. 17 refs.

Keywords The modern printing technology. Reading transformation. Classics reading.

(上接第10页)

- [36] 王余光. 阅读, 与经典同行[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2.
- [37] 徐雁. 纸老, 书未黄[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2.
- [38] 彭国梁. 近楼, 书更香[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2.
- [39] 黄俊贵, 邓以宁编著. 社会阅读与图书馆服务[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0.
- [40] 贺霞, 冯建福主编. 全民阅读和图书馆服务[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0.
- [41] 肖雪著. 促进老年人阅读的公共图书馆创新研究[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0.
- [42]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编. 国民阅读推广与图书馆[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1.
- [43] 吕梅主编. 播撒阅读种子守望少儿幸福 青少年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
- [44] 李超平. 公共图书馆宣传推广与阅读促进[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 [45] 史蒂文·罗杰·费希尔编著. 阅读的历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46] 罗伯特·达恩顿著. 阅读的未来[M]. 北京市: 中信出版社, 2011.
- [47] 张贺. 世界出版大国的阅读尴尬[N]. 人民日报, [2011-04-08].
- [作者简介] 何官峰, 馆员, 现在西南大学图书馆工作。
- [收稿日期] 2014-12-24 (刘平 编发)

Review of Research on Library and Reading Promotion

He Guanfeng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Sichuan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library and reading promotion from 2008 to 2013 in China,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results,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and some countermeasures about research on library and reading promotion. 47 refs.

Keywords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Nationwide reading.